

《播火录》：人文视角看科学

何志云

前不久,由钟制宪担任总策划、赵致真担任总撰稿和总导演的电视纪录片《播火录——科学发现的人文启示》播出了一季10集。该片对于浩瀚的现代科学史并不是简单的重现,而是有着自己独特的思考和发现,其主旨鲜明,风格清新独特,颇值得观赏。

作品开篇即呈现出一种历史的厚重感,片中对科学家群体的评价不落俗套:科学家“……以探索自然奥秘构建知识体系为宗旨,以忠于客观事实遵从逻辑自洽为操守,平日在书斋中凝神静思,在讲坛上放言高论,在实验室寻踪觅迹,而一旦真理召唤的时候,又能以特有的胆略和勇气冒险犯难,甚至甘以身殉,不借献出宝贵的生命。”

同样,在表现1930年的普林斯顿研究院时,面对普林斯顿研究院灿若群星的科学大师,比如爱因斯坦、诺依曼、哥德尔、奥本海默、狄拉克、拉比、盖尔曼、戴森、玻尔、陈省身……作品超越他们的具体功绩,从人类的生活方式的高度赞叹道:“不受世俗羁绊,不生生计担忧,不用拼死拼活,不需尽职尽责,这里唯一的使命,就是天马行空地思考。”

这才是“学者的天堂”!是谁建造了这样的“天堂”?作品讲述了从诺贝尔开始,经索尔维、卡文迪许、海、叶凯士、胡克、卡内基、哈佛、霍普金斯,最后到斯坦福、珍妮、史密森尼等一系列企业家和富豪,他们怎样倾囊中所有,捐资或集资办大学、办研究院,支撑着科学和科学家的进步事业。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对于财富的不同支配方式,也不仅仅是一种富有道德感的生存理念,更重要的是,作品让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科学属于全人类,是真正超越种族、超越政治和党派、超越意识形态纷争的,属于全人类共同理想和追求的崇高事业!于是,科学不再与我们漠不相干。

《播火录》并没有对现代科学史一味“评功摆好”,把作品简单地拍成赞歌,而是基于一以贯之的辩证精神,以分析渗透思考,寓发现于颇具说服力的辨析。若说它的独特性,应该是来自有据,丝毫不牵强的。比如,在论及诺贝尔科学奖时,作品既回顾它对科学发展具有无可替代的推进作用,又客观展现和分析了它的诸多不足和缺陷,通过爱因斯坦、彭加勒、门捷列夫、爱迪生、哈勃等科学家一个个生动的故事,使我们增添了知识,开拓了眼界。一方面,能更全面、更客观、更有分析地看待诺贝尔奖;另一方面,则进一步接受了理性和科学精神的熏陶。

这种理性与科学精神,贯穿了《播火录》的全部,成为作品鲜明的灵魂。作品以《文明的代价》一集,专题展现人类在享受科学发展的利益时,或因无知、误用或者滥用科学,给人类带来巨大的伤害,如X光曾经损伤了整整一代人的健康,氟利昂破坏了臭氧层,至今难以修复,等等;或因迷信科学,把科学当成万能良药。不加节制的“科学主义”偏执,给社会带来了重大灾难,如含铅汽油的使用,化学药剂进入农业,等等。播下的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这在科学史上比比皆是,值得我们警惕。

片名曰《播火录》,在我看来,一方面寓指科学对于人类,犹如普罗米修斯盗天火,蛮荒之地从此火种蔓延,开出一片文明的新天地;另一方面,我以为还有播火传薪,让科学的精神传遍天下的意思。为科学的进步和发展终生奋斗甚至牺牲自己的科学家,就是现代的普罗米修斯!而科学的发展永无止境,科学的理念与精神,也需要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并且成为人类永恒的思想文化遗产。这是人类不变的使命!

《播火录》的意义或许比我们想象的更深远。电视是20世纪以来改变人类生活的若干重大发明之一。但是很不幸,当今中国,电视台电视频道多如牛毛,充斥的却是无聊乏味、无病呻吟却又无孔不入的娱乐、搞笑节目,严肃的充满科学精神的节目,几乎濒临灭绝。我们如果只是热衷于模仿作秀、喜欢作乐,我们的民族还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吗?我们的下一代整天看这样的节目,他们又能有怎样的梦想和明天?

《播火录》其实是有鲜明的针对性的,它用多种电视表现手段,围绕今天中国普遍存在的科学“贫血症”,以观众为中心,以富有哲理思辨与文学色彩的语言,生动地、起伏有致地讲述现代科学史。一集一集地看下来,犹如一堂堂有趣而难得的科学与思想史教程。从这个意义上讲,《播火录》既是有利国利民、功在子孙后代的好作品,对众多电视从业人员而言,岂不也能从中获取许多有益的启迪?

聆听非遗的回声

徐迅雷

当网友们热衷于使用拟声词“洞次打次”的时候,杭州老字号“潘永泰”那悦耳动听的“蹦蹦”声,不久前戛然而止。

“潘永泰”棉花店的第三代掌门人、81岁的潘文彪老人,静静地让人告别了人世。开在河坊街113号的“潘永泰”,是杭州仅存的最后一间弹棉花店;那手工弹棉花的声音,已经回响了近百年。今后,今后的今后,我们可能再也听不到那“蹦蹦”的原声了,只能让模拟架子鼓的“洞次打次”声,充满网络世界。

潘文彪老人是省级非遗技艺传承人。他弹棉花的手艺是祖传的,工具就是一弯吊弓、一个弹板、一张磨盘、一条牵纱线,“榧木榔头杉木梢;金鸡叫,雪花飘”,一声声响响,一片片花飞,一床床温

暖的棉花,就飞进了千家万户。而今,“潘永泰百年弹棉花的技艺有失传的可能”。

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比,物化的遗产因为直观、可见,保护起来相对容易一些。西湖三潭印月的三座石塔,开始为时一个多月的维护保养,要清理表面、填补裂隙,加装水下防浪涌网、升级周边安全防护网。两年前三潭印月夜间游船撞倒一塔塔意外,不应再发生。

如何保护、传承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共商大计、共同努力。杭州一些老艺人,或相继去世,或年事已高,一些民间技艺濒临失传,这是面临的现实。其实,全中国都一样,非遗技艺或多或少面临着后继无人的窘境。刚刚看到报道,国家级非遗项目——安徽的“徽墨制作技艺”,其传承人周美洪也担心

“走进博物馆”。徽墨在烟熏、火烤和捶打中诞生,传统的制墨工序有十几道。“繁杂的徽墨制作更是个体活法,而现在的年轻人多喜欢挣些轻巧钱。”

应立即马提上议事日程——这已不是个人的事,而是地方政府的责任所在了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璀璨星空中的花朵。正如童话名著《小王子》中小王子所说的:“如果一个人爱上了亿万颗星星中的一朵,他希望星星就都像他幸福。他对自己说:‘我的花在那儿……’但是,如果羊把花吃了,对他来说,所有的星星都忽地熄灭了!”小王子的声音,仿佛就是非遗技艺,需要我们认真聆听。对于文化而言,记忆性的记录、保护性的留存、弘扬性的展示,都是需要去做的工作。

王林事件与科学何干?

郑念

最近,由于王林事件,许多学者开始反思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观点:

一是认为,出现类似王林事件,是由于中国公民的科学素养低,缺乏科学精神,从而导致轻信、迷信和盲目崇拜;二是认为,这些事件是打着科学旗号的伪科学,是科普工作做得不够,要用科普进行辟谣,从而鼓励大家设立微信科普辟谣;三是认为,导致这些现象的原因是事件背后有强大的推手,是一些权力人物、公众人物、大V在背后撑腰并推波助澜。而且,由此大家联想到上世纪末在中国大地盛行的伪科学、伪气功和特异功能现象,似乎,历史再三说明,提高公民的科学素养,这些现象就会消失,就没有人会相信,就不再有骗子出现。这种想法其实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一厢情愿。大家知道,无论是上世纪末的伪科学盛行,还是众多气功师横空出世,还是通天教主诞生;也无论是古代、近代还是现代,这些现象的实质并没有什么不同。

先来看看事件构成的主体和要素。任何

事件的构成离不开主体和客体,事件发生的原因也都可以用传播学的几个要素来加以描述,即什么人、什么事、什么时间、为什么发生、有什么效果、通过什么传播的。

从主体看,王林、张悟本、李一等等,无一不是从事科学研究或科技工作的。因此,他们发表的言论或者发生的行为,纯属他们自己的事情,与哪个科技团体或组织都扯不上关系;他们也不是为了评职称评奖而发表不是科学冒充科学的论文。因此,就不是科学范畴的事件,也就没有必要称其为“伪科学”。

从客体看,没有一个人是通过学术期刊、学术组织、学术会议发声的,其科学与否,似乎也无从论起;如果没有大众传媒渲染和广泛传播,也不会造成这么大的影响。而且,在传播过程中,从事科学的组织和人员,也没有为其做出任何学术评论和担保,所以,也不是冒充科学在传播。

从受众看,公众也不是为了获得知识或者学习需要而相信、接受甚至扩散的。他们大多是为了自身健康、为了得到庇护、为了升官发

财而自愿相信的,有的甚至达到了迷信的程度。也有因为相信而遭受财产损失。

从影响效果看,类似事件除了渲染起自然能力以外,没有任何正能量的成分,也不会给科学事业、科学研究带来好的或不好的影响。但是,却能够在公众中造成很坏的影响,给社会带来不安定甚至恐慌。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王林事件都是彻头彻尾的诈骗行为,跟科学扯不上,因此也不是什么伪科学事件,受害者大多不是所谓的科学素养低下。相反,其中不乏社会精英:既有企业家,也有影视明星,还有政要和将军。正是这些人的行为,起到了不良的示范效应。这些已经非常成功的人士欣赏和求助神秘力量,无非是想求得超自然力量的帮助,求更加“红火”。没有成功的人士则无非想走捷径,攀上“高枝”。

当然,事件背后的原因很复杂,社会、文化、心理、政治、经济,等等,不一而足,但不管外因如何,内因却是主要的。而真正应该认真思考的是,媒体及其传播者的社会责任何在?

怪异言行背后的考量

段伟文

提倡文明 体谅人性

朱效民

上厕所是全世界人民共同关心的话题,世界上不但有厕所,还有专门的世界厕所组织。从历史上看,厕所的发展趋势是越来越成为一个让人感觉自然、舒适、惬意的地方。

改革开放之初,有国际友人戏称中国当时的厕所是“你好”厕所,因为厕所内各个蹲坑不但一览无余,相互间没有隔板,甚至有的厕所还会有面对面的两排蹲坑,因此大家一起如厕时,可以坦诚相见、互致问候。厕所如此,人何以堪?中国人如厕的行为举止就没法说了。

今天,中国的厕所,尤其是大城市中的一些厕所,硬件方面已经基本与国际接轨了,但在软件方面,如公共管理、如厕行为等仍然相对滞后,不时为人所诟病。中国游客如厕时大小便后不冲水、顺手带走厕纸、甚至踩在马桶上方便、小孩在大街上随地便溺等不文明行为,更是屡见报端,不一而足。

现如今,走进各地的男厕所,几乎每个小便池的上方墙壁都有各种各样的文明宣传。有好言相劝的——“前进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有直言不讳的——“扫射、乱射,不如瞄准再射”,还有讽刺挖苦的——“尿不净是因为你软,滴外面是因为你短”。有时小便池一边的整个一面墙都红红绿绿的,简直成为厕所一景。显然,光是一味地加强宣传力度,单方面要求宣传对象“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基本上是割头挑子——一头热,从传播的角度看还有没有别的思路呢?

从传播学的需求理论来说,受传者的认可才是硬道理,要认识到传播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不能只是传播者单方面一味提要求,同时要考虑到受传者的难处及喜好等。韩国有关人员曾发现,女厕所的用水量超过男厕所,这让他们有点疑惑不解。经过观察,原来女士们上厕所时,为避免发出冲水的声响而尴尬,总是先放水一水箱的水,借着放水、冲水的声响完成上厕所。了解到这一点后,韩国专门在女厕所的各个厕位安装了播放背景音乐的设备,只要人一进去就会有悦耳的音乐响起,一直伴人出来为止。这样女厕所的用水量就降下来了。

此外,要提高传播方式和策略的针对性,如对屡教不改的不文明者也可考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法国巴黎有一个街区遍布酒吧,夜生活十分丰富。管理者有一个问题十分头疼:经常有人困兽事,在夜里趁黑暗对着墙根撒尿。起初管理者通过警告、罚款等措施来制止,但效果始终不佳。后来想出一个办法:把经常有尿渍的墙根做成波浪形,再有人图方便时,尿液会反弹到其裤子上。渐渐地该地区这种随处撒尿的行为就消失了。

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公厕里的文明有赖于整个社会群体文明素质的普遍提高,远不是集中搞一些文明宣传、突击开展几场卫生运动就能大功告成的。同时提升人的现代文明素质也是一个提倡者和接受者相互体谅、一起进步的漫长过程。日本有识之士曾坦言,其实就在不久久远的过去,日本的公厕也很脏,日本游客也曾在国外被人鄙视,但由于持续努力地提高了全民的现代卫生意识,人人都爱干净,逐渐使得日本成为今天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干净的国家”。

在这个倡导、传播“厕所文明”的过程中,尽可能顺其自然地尊重人性、体谅人性,并做出适当的“设计”,往往能收到出奇制胜的效果。

社科院一位研究人员的博客抄袭及不当回事件过去一段时间了。时值气候反复无常的仲夏,此事件引起了轩然大波,当事人立马成为众矢之的,也给他原单位造成了莫大的困扰。由于此事事实清楚,单位基本处理的方式应该是严肃的批评教育、责令道歉。在采取了这些“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必要举措之后,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深入考量,这涉及对本人本身的关怀,即当事人为什么会有这种极端不智的态度?

其实,当事人“无权无势”,仅仅是位普通的退休研究员,为什么会做出这种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事来?据了解,他早年经历坎坷,青年时代主要从事科学专业杂志翻译工作,其真正的哲学学术生涯很短,中间身体还出现过重大问题。他虽勉强通过职称等名利角逐,但没有成为博导,种种理想与现实的鸿沟和不够成功的事实对其内心所造成的压力可想而知。

此事件的表象与社会观感善恶确是事实,但深层问题可能是不那么成功的研究人员的心理健康问题。即便从常识的眼光来看,当事人的一些话语风格之怪异,其所编造的理由牵强还振振有词,皆可见其中存在着复杂的心理因素。这种怪异的言行实际上类似于文学作品

中的一些酸腐文人如方鸿渐、孔乙己等人的性格表现,而那些人的独白如果像今天这样拿到微博晒晒,效果应该是类似的。

因此,对研究人员的心理健康问题给予一定的人文关怀,应该由此事件引出的一个有价值的反思。以人文社科研究人员与高校教师为例,特别是社科院的研究人员主要在家办公,加之教育部给社科院的研究生指标很少,没有多少学生可以交流,不那么有名的或业务不繁忙的大多数研究人员其实十分寂寞。有的人耐得住寂寞做出了成就,但那种寂寞也使他们长期处于见物不见人、门朝天开的状况,其社交能力与情商的发展受到限制,很多时候容易话唠、偏激、耽于幻想、自说自话。

对他们中的不少人来说,有机会说说说什么重要,而且很多的时候会把握思想和猜测当作事实来讲。这些心理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纾解,就会发展成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它是导致很多学历、层级、文化程度高的人会在没有预兆的情况下爆发出偏执、硬拗等令人难以理解的行为的重要内因。我们应该曾经目睹或听说:一



官员证实税务部门或对“电子红包”征税

以改革创新赢取价值认同

沈伟鹏

传统出租车司机一直承担高额的“份子钱”,近年来有关出租车司机“过劳死”、职业病的新闻不绝于网上。高劳动强度使出租车行业无可争议地被评为压力最大的职业之一。另一方面,司机的辛苦却并没有带来消费者对外出出租车行业的同情和认可。出租车行业多年来一直广受群众诟病:车难打、难打车、拒载、绕道等行为一直是广大乘车人投诉的热点。

相比之下,新兴打车软件所提供的叫车服务,通过互联网服务呼叫平台、GPS运营路线跟踪系统、服务评价系统、奖金刺激和监督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治理了出租车行业的顽疾,实实在在地提升了打车者的服务体验。

当前争议的焦点集中于两方面:一是法律制约。新兴打车软件已经“占山为王”,聚集起超乎想象的私家车数量。然而,这些提供运营服务的私家车辆,按照现行的法律规定均属于“非法运营”。二是利益之争。数量庞大的私家车“非法运营”,挤占了出租车公司和出租车司机的合法利益,这一矛盾如不能得到理性、及时、妥善

的处理,后果将不堪设想。

核心价值观是国家、社会和个人层面的灵魂问题和核心问题,城市管理者所坚守和遵循的法律法规,应该以符合核心价值观法治理念的“善治”出发,正视、解决城市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

解决上述两组矛盾首先要明确对私家司机司机的价值认同问题,从发展的角度承认和肯定他们是“合法”的从业者,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从这个角度出发,私家司机为实现个人的幸福、增加个人收入加入到服务体系中来,政府要与时俱进大胆地探索政策变革,试点性地允许某些城市的私家车合法地运营,并对其进行有效的监管。这符合近期国务院有关文件多次提及的促进就业、实现“互联网+”等政策。

其次,要最大程度地保障传统出租车司机的合法权益。如浙江义乌,已率先提出出租车“份子钱”的减免改革。出租车行业的改革势在必行,新兴打车软件“倒逼”出租车几十年不变的“行规”。高额的“份子钱”已在事实上“逼迫”大量出租车司机“投奔”所谓“非法”的运营软件旗

下。较为轻松的劳动节奏和宽松的劳动时间,符合当代人对劳动条件的要求。因此,时代对出租车行业的管理机构和出租车公司提出了新要求,不仅要从事管理制度和管理形式上进行改革,树立服务群众的意识,同时也要在真正意义上建立起人本关怀的员工体制。

第三,以处理上述矛盾为契机,在出租车行业真正建立起法治和公平竞争体制,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到微观社会生活领域。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说过,法律如果不被信仰,它便形同虚设。中国古代也讲天道不欺、天网恢恢。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应该仅仅是街上各处宣传的一个口号或者符号,而且要体现在经济和社会治理的实践中,并最终成为国民内心的信仰。新兴打车平台与其他传统产业一样,都应该赋予同等合法的市场资格,只要它能够为人民群众的生活提供便利、促进社会就业、改善社群关系,那么国家就应该与时俱进通过立法、执法调整原有不合理的竞争关系,夯实公平竞争原则,促进整个社会经济基本秩序的良好运行,保障

公民的合法权益,最终实现以改革创新赢取民众价值认同。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社会取得了长足发展。毋庸讳言,我们在高速发展中的确积累了一些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从表面上看是社会失衡的问题,而究其根源则是社会发展理念落后和社会治理水平差所导致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明确要求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治理中。可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不应仅仅停留在学习研究的层面,更应该要求各级城市管理人员在实际工作中领会和运用。

小小的“打车软件”已经在神州大地掀起诸如社会公平、劳动尊严、社会正义等涉及价值观问题的讨论,并且真实地影响着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数。如何在出租车行业建立新型治理结构,提升治理能力、化解行业矛盾,并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到实处,从而赢得民众价值认同,成为考验各级城市管理者智慧的一道新命题。

(作者单位:国家行政学院)